



教研相长七书

IAOYAN XIANGZHANG QISHU

行龙◎主编

# 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教研相长七书

# 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

JIAO YAN XIANGLIANG QI SHU

行龙◎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 / 行龙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3

ISBN 978 - 7 - 5203 - 2297 - 3

I. ①区… II. ①行… III. ①区域社会学—社会发展史—研究—  
中国 IV. ①C912. 8②K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8953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安芳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李寡寡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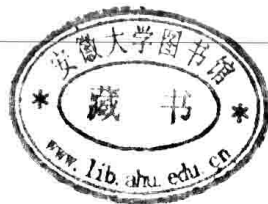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6.5  
插页 2  
字数 246 千字  
定价 65.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教研相长七书”总序

“教学相长”，可谓耳熟能详。《礼记·学记》谓：“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这里所说的“教研相长”，则是强调教学和研究的互相促进，互相提高。教学和研究，两者融为一体，相得益彰，那是一个大学教师应该感到很欣慰的事情。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 20 多年来，秉持教研相长的优良传统，一直强调在做好科学研究的同时，做好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工作。既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融入教学实践中，又要把教学实践中的问题引入自己的科学研究中，由“知不足”“知困”，到“自反”“自强”，确实朝着“教研相长”的方向不断努力。

2008 年 5 月，在山西大学举行的建校 106 周年纪念活动中，我在大会上有一个发言，题目叫作“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史学”，初步总结了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以来立足前沿、学科融合、关注现实、培养人才、教研相长五个方面所谓的“经验之谈”。其中的“教研相长”如此谈道：

教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传道、授业、解惑即为师之本。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是重科研而轻教学，它与不合理的各种考核和晋升条件有直接的关联，也与社会风气的影响直接相关。我记得，1985 年留校任教后，乔志强先生曾和我有过一次认真的谈话，主题就是讲教学是教师的第一要务，站不稳三尺讲台，就没有立身之本，青年教师要把过好教学关当作工作后的第一关去认真对待，不得丝毫马虎。三十年来，我一直把老师的忠告铭记心间，即使在最近这些年繁重的行政工作压力下，我也尽量给本科生

上课，争取上好每一节课。对自己的学生我也如此要求，尽管可能会累一点，但我们作为一个教师，心里实在有一种良心上的满足感。目前，由我带头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课程已成为国家优秀精品课程，团队也获得国家优秀教学团队的荣誉。我们还以精品课程为核心，开展了“校园历史文化节”“鉴知精品课程青年教师培训班”两项活动，有关的教材也在积极的编写过程中。事实证明，通过高质量的教学活动，大大促进了科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教研相长绝非空词。

“教研相长”是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以来的一个好传统。乔志强先生在世时，不仅开拓性地率先开展社会史的研究，而且带领众弟子编写《中国近代社会史》一书，以此获得了教育部优秀教学成果奖，成为至今许多高校本科生、研究生的必读书和教材。乔先生仙逝后，我们又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虽然将研究的重心由整体社会史转向区域社会史，但教研相长却一以贯之，努力以赴。围绕10多年前为本科生开设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课程，我们组建了“区域社会史”教学团队，获得了国家精品课程、视频公开课、优秀教学团队等荣誉，山西大学历史学科以此成为国家级特色学科，并建立了国家级的校外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2014年，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共同授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单位”的荣誉称号。

毋庸讳言，目前中国高等教育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和问题，其中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表现比较突出，许多高校的研究机构人员很少甚或没有为本科生上课的教学任务，导致科研与教学的严重脱节。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重课堂学习轻研究训练，已经成为普遍诟病的问题。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不足10人，我们既作为研究团队，又作为教学团队，一肩双任，虽苦犹乐，这是因为我们首先是一个大学的老师。在科研和教学的长期实践过程中，我们确实有一份责任感，又有一份快乐感。

“教研相长七书”的一个小小意愿，就是把我們长期以来围绕中国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的教学实践公之于世，接受大学生、研究生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批评，以便继续深化这方面的工作。

以下就“教研相长七书”分别作以简要的介绍：

一、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该书为乔志强先生“和青年教师的集体尝试”，该书分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三编建构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知识体系，内容包括人口、家庭、宗族；社区与民族；社层变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人际关系；教养功能；控制功能等。有学者称为“乔氏体系，三大板块”。正文之前有乔志强先生撰写的长达35页的“导论”，讨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社会史的知识结构、研究社会史的意义、怎样研究社会史四个问题。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的社会史研究著作，有评论认为此书为社会史研究“从理论探讨到实际操作迈出的第一步”，“具有某种划时代的意义”。该书又有台北南天书局1998年6月中文繁体本，已经成为许多大学本科生、研究生的必读教材。

二、行龙主编《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2004年开始，由我牵头在山西大学历史系开设《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课程，期间，或历史专业选修课，或全校公开课，连续十余年未曾间断。该课程以“集体授课”的形式进行，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8位教师共同担当本课程的授课任务。2007年，该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次年区域社会史教学团队被评为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2013年，该课程作为教育部精品视频公开课向社会开放。授课的同时，我们就在进行着相关教材的编写，结合授课实际和学生的反映，大家一起讨论，反复修订，课程讲授—田野考察—修订教材，不断地循环往复，终于完成了这本经过10余年努力而成的教材。该书共七章一个绪论，讲授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趋向、学科定位、区域特性、小地方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资料等内容，意在提供给学生一个怎样研究区域社会史的入门教材。

三、行龙主编《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本书为“山西大学百年校庆学术丛书”之一种，“是我和近几届硕士研究生共同完成的”。“本书除前面两篇有关社会史及区域社会史的理论问题（行龙：《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乔志强、行龙：《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论——兼论地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外，对近代以来山西人口、水资源及水案、灾荒、集市、民教冲突、祁太秧歌等分专题进行了研究。应当说这些问题都是之前很少涉猎

或没有研究过的问题，我们试图从社会史的角度对此进行探讨。”时间过得真快，一晃该书已面世 14 个年头，昔日的硕士生已成长为大学的教授，我感到很是欣慰。又，正是本书当年的责任编辑郭沂纹先生的肯定和支持，才催生了“教研相长七书”，对此要对她道一声感谢！

四、行龙主编《集体化时代的山西农村社会研究》。此书可以看作前书的姊妹篇，也是社会史研究中心硕士生毕业论文修改而成。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研究，是近年来中心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多篇硕士、博士论文围绕此方向展开。该书所涉内容包括两大类：一类为集体化时代的某个村庄问题的研究，典型农村如西沟、张庄，一般农村如赤桥、剪子湾、道备等；另一类为专题研究，如新区土改、医疗卫生、水土保持、农田水利、文化生活等。需要说明的是，正如前书的副标题一样，各篇论文的形成，都实践和体现了“走向田野与社会”的理念。论文“或以资料翔实见长，或以立题新颖取胜，各位都注意到充分利用田野调查和地方文献，下过一番苦功夫”。现经中心诸位教师讨论，从数十篇中选取十篇结集出版，接受读者的指正与批评。

五、行龙主编、郭永平副主编《在田野中发现历史——学生田野调查报告（永济篇）》。走向田野与社会，是我们多年来从事社会史和区域社会史教研工作中的追求与实践。“这里的田野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相对于校园和图书馆的田地与原野，也就是基层社会和农村；二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工作，也就是参与观察实地考察的方法；这里的社会也有两层含义：一是现实的社会，我们必须关注现实社会，懂得从现在推延到过去或者由过去推延到现在；二是社会史意义上的社会，这是一个整体的社会，一个‘自下而上’的社会。”<sup>①</sup> 田野工作是中心和历史学专业每一届学生的必修课，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这一做法，学生收获良多。

位于山西省南部的永济，是我们与永济市人民政府共同建立的国家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近年来，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的教师结合《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课程讲授，带领学生在永济进行了多次田野考察，该书收录的学生作品含学术论文、调查报告、田野日记三部分。

---

<sup>①</sup> 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19 页。

虽显稚嫩，但对我们而言却十分重要，因为这是多年来学生田野工作的一次集中展现。

六、行龙著《山西区域社会史十五讲》。该书从我近年来发表的数十篇有关山西区域社会史的论文中辑出。书分六部分内容，涉及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主要脉络，新的研究领域、田野考察、资料发掘、人物研究及山西大学校史的相关问题。这些论文都是在教学过程中“初次亮相”，进而吸收各方意见成稿，也可以说是本人“教研相长”的成果。

七、胡英泽、张俊峰主编《区域社会史研究读本》。这个“读本”，或可叫做“选本”，也就是一个教学参考书。记得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有一门课程是“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很受学生欢迎。区域社会史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30年来却有那么多的成果出现，既要选的精当，又要使学生爱读，既要有理论方法的引导意义，又要兼顾具体的实践操作，实在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又，这个读本只收录了部分中国学者的作品，限于篇幅未能收录海外学者的作品（有机会可再编一本《海外读本》），意在使读者减少隔膜感而增进亲近感，这样的初衷或许更符合读者的口味。“学识有限，难免挂一漏万，留遗珠之憾”，并非一句客套话。

“教研相长七书”编订之际，既有一分欣慰，又有一分忐忑。我们在长期从事历史研究的过程中，认真地从事了相关的教学工作，从大家的谈论中，从学生的反映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做教师的快乐。另外，“教研相长”又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和努力的过程，在目前这样的环境中也是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心血的过程。过程之漫长并不可怕，好在这个过程是快乐的。

时值2016年教师节即将来临，新的学期也将开始，愿以“教研相长七书”以为纪念，期望读者诸位多加指教。

“教研相长七书”整理、编排过程中，马维强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特以致谢。

行 龙

2016年8月29日

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 目 录

绪言：区域社会史研究诸问题 .....	(1)
第一章 区域社会史的学科定位 .....	(15)
第一节 社会史与区域社会史 .....	(15)
第二节 区域的时空界定 .....	(26)
第三节 地方志、地方史与区域社会史研究 .....	(37)
第二章 生存环境与区域特性 .....	(48)
第一节 区域特性的外在表现 .....	(49)
第二节 重视区域社会的历时性与共时性 .....	(59)
第三节 生存环境与区域特性研究的四个维度 .....	(67)
第三章 小地方与大历史 .....	(82)
第一节 小地方与大历史的建构 .....	(82)
第二节 小地方与大历史的书写 .....	(91)
第三节 小地方与大历史的陷阱 .....	(101)
第四章 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 .....	(113)
第一节 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宏观理论 .....	(114)
第二节 区域社会研究的中观理论 .....	(124)
第三节 区域社会研究的具体实践 .....	(137)
第五章 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	(149)

第一节	自下而上、以小见大 .....	(149)
第二节	多学科交叉的视野 .....	(159)
第三节	田野工作与文献解读 .....	(173)
<b>第六章</b>	<b>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资料 .....</b>	<b>(187)</b>
第一节	旧史料的新解读 .....	(187)
第二节	新史料的挖掘 .....	(207)
第三节	新史料的拓展 .....	(221)
<b>第七章</b>	<b>走向田野与社会 .....</b>	<b>(229)</b>
第一节	走向田野与社会的缘由 .....	(229)
第二节	走向田野与社会的诉求 .....	(237)
第三节	走向田野与社会的意义 .....	(242)
<b>后 记</b>	.....	<b>(254)</b>

## 绪言：区域社会史研究诸问题

关于《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这篇所谓的绪言部分，有一点首先需要向读者做个交代。十多年前，在山西大学初次开设这门课程的时候，绪言部分主要讲的是“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这样一个学术演变过程，附带介绍了以下七章的主要内容。值此本书出版之际，鉴于有关学术史的内容在以后的章节中也有体现，为集中体现本书主题，经与中心诸位同仁讨论，改作为我们对目前区域社会史研究几个问题的讨论。故此，目前读者在网络上看到的国家精品课程《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视频，与此会有出入，诸君鉴之。

目前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或者说大家热议的问题，我们首先从“碎片化”谈起。

### 一 从“碎片化”谈起

无论从西文中转译过来的“碎化”与“碎片化”确切与否，“碎”字在汉语中最一般的理解就是破碎、粉碎，另一个意思是琐碎、细碎。碎片则是散乱一片，“一地鸡毛”。笔者接受社会史研究应当碎化的做法，就是要把研究对象咬碎嚼烂，烂熟于心，化然于胸，然后付诸笔端。而“碎片化”则是研究者需要力戒和摒弃的，这是因为只有碎片一地，却没有那个“有似绳索贯串钱物”<sup>①</sup>的东西，只能是碎片越来越多，景象越来越乱。反之，如果有了那个“有似绳索贯串钱物”的东西把一地的“碎片”再串通提起，这样的“碎片化”倒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其实，说社会史研究“碎化”或“碎片化”，主要还是批评其研究对象和选题的琐

<sup>①</sup> 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碎罢了。

社会史研究中出现“碎化”的现象，其实与其学科的特性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研究过程中自然而然的現象。我们知道，社会史首先是建立在对传统史学的反思、批判的基础上。西方传统史学以实证为重，注重叙述事件而缺少推理分析；注重抄录史实而不作概括归纳；注重研究个人而忽视集团；注重上层人物而忽视下层民众，有人将此概括为“事件的历史”。在中国，梁启超在倡导新史学的同时猛烈批判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述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那就是一种“帝王将相”的历史。社会史研究在批判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异军突起，又在批判传统史学的基础上树立起旗帜，这个旗帜的核心就是代表着新史学发展趋势的“总体史”。勒高夫在谈到伏尔泰等“新史学的祖先”时明确指出：“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王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这是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这是有演进的、变革的运动着的历史，不是停滞的、描述性的历史；是有分析的、有说明的历史，而不再是纯叙述性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sup>①</sup>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除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时代背景推动外，史学界本身的自省也是一个重要的动力。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一个时期以来，史学研究被浓厚的政治意识所笼罩，以政治史尤其是阶级斗争为主导的史学，不仅不能反映历史的全部和真实，而且使研究越来越苍白干瘪，在一片“史学危机”的呼声中，“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sup>②</sup>，成为复兴社会史研究的最强音。复兴最初的中国社会史，无论“专史说”还是“通史说”，都在强调一种全面的历史或总体的历史。于是乎，人口、婚姻、家庭、宗族、城市、农村、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庆习俗、教育赡养、自然灾害、会党土匪、宗教信仰等均被纳入社会史研究的视野。柳暗花明又一村，具有新史学色彩的社会史研究

① [法] 雅克·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姚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50页。

大大地超越了传统史学的研究领域，一时间给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之感。正是在这样一种复兴初期扩展领域和“占领地盘”的过程中，90年代初期，即有学者批评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碎化”，好像社会史学科也是一个杂物筐，什么东西也可以往里面装。

应该说，社会史研究过程中出现的“碎化”现象，实际上就是在“总体史”的旗帜下自然产生的一种学术现象，西方社会史研究亦复如此。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1987年出版的《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即是对年鉴派史学进行评介的书。<sup>①</sup>问题是，研究者如何在自然的“碎化”过程中自觉地避免“碎片化”，依笔者之见，还是要回到总体史的路子上来，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总体史。只有如此，才可能使社会史研究真正摆脱“碎片化”的境地。

在笔者看来，社会史意义上的总体史并不是简单地追求研究对象上的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甚至是越多样化越好、越琐细化越好，也不是单个社会要素连续相加重叠的混合体，而是一种多种结构要素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多层次的统一体。布罗代尔特别强调，“所谓总体，指的是一个统一体”。<sup>②</sup>他所倡导并实践的结构、局势、事件“三时段”历史，首先就是一种互相联系和互相作用的总体史。马克·布洛赫说：“无论什么性质的社会，一切事物都是互相制约、互相联系的，政治、经济的结构与信仰及思想最基本、最微妙的反映都概莫能外。”<sup>③</sup>社会史的选题应该没有大小之分，再小的选题也可以是社会史的选题，关键是要“以小见大”，在总体史的眼光下寻找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作用。同样，只有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上把握总体性，“保持总体化的眼光”，再小的区域也可以做出社会史意义上的总体史。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一书，其研究对象虽只是中世纪法国南部一个拥有数百人的小村庄，但它却试图把构成和表现13—14世纪蒙塔尤社区生活的各种参数一一揭示出来，“明确

① [法] 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马胜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 [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杨起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页。

③ [法]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页。

表示了新史学的总体研究愿望”。我想进一步强调的是，社会史意义上的总体史与唯物辩证法中整体的观点、普遍联系的观点也是息息相通的。

避免“碎片化”的办法就是从总体的观点进行多学科的交融。彼得·伯克有言：“各个学科的结合是对碎片化的补救”，“揭示地域、社会群体与各个学科之间的关联，是与碎片化进行战斗的一种方式”。<sup>①</sup>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本来就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特征，年鉴学派自创始一直到如今第四代学者 80 年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多学科不断交流和融合的过程。即使当今西方流行的微观社会史，也有许多优秀的能够体现总体史的著作。“由于教科书是通论性质的，你并不必须对每一个小问题都进行研究，而一部好的微观史却同时需要具备细节、证据和总体史的雄心。”“倘若一部微观史写得好的话，它应该是一部有着自身深厚内蕴的研究，但同时也会揭示出与在它之外的其他进程的事件的关联。”<sup>②</sup>

这就是说，只要我们“保持总体化的眼光”，进行多学科的交流对话，勇于和善于在具体研究中运用整体的、普遍联系的唯物史观，再小的研究题目、再小的区域研究也不会被人讥讽为“碎片化”。可惜的是，我们仍有一些研究者并没有把总体史的眼光贯穿到自己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对此，早在 1950 年，布罗代尔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中就引用年鉴派创始人费弗尔的话大声疾呼：“最好不过的是，每一位学者在从事他自己的正规专业、忙于开垦他自己的花园时，也应该努力注意邻人的工作。但是，往往由于院墙太高而被挡住了视线。倘若这些不同团体之间的智力交流更频繁一些，那么将会有多么丰富的关于方法和关于事实解释的珍贵建议，会有怎样的文化成果，会在直觉上迈出怎样的一步！”<sup>③</sup>应该说，“碎化”或“碎片化”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碎而不通，碎而不精。目前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已经出现了多学科交叉的良好势头，也有一些较为成功的著述出现，但未来的路程仍然十分漫长。

---

① [英] 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78—179 页。

② 同上书，第 76 页。

③ [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0 页。

## 二 区域社会史研究不一定“碎片化”

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往往被认为是“碎片化”表现突出的领域。其实，现在我们谈论所谓的“碎片化”问题，主要还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区域史（包括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历史人类学）研究对历史的整体面相不断进行局部解释的缘故。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区域社会史的历史书写也往往容易被人误解为“碎片化”。

不可否认，目前学界确实存在一些区域社会史研究过于简单化的做法，就区域言区域，未能将区域内部各组成部分以及区域与整体之间有机地联系起来进行讨论，虽然占有区域性的具体史料，但却陷在史料当中不能自拔，更多地只是将视野限定在所掌握的史料层面上，就史料言史料，不能很好地将“小地方与大历史”的复杂关系全面客观地诉诸笔端，对史料自身的产生背景及具体意图也视而不见，结果实践越多，“碎片化”日深。就“区域研究”中的“某种反省和自我批判的态度”而言，陈春声教授也曾指出：“深化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区域研究的关键之一，在于新一代的研究者要有把握区域社会发展内在脉络的自觉的学术追求。毋庸讳言，时下所见大量的区域研究作品中，具有严格学术史意义的思想创造的还是凤毛麟角，许多研究成果在学术上的贡献，仍主要限于地方性资料的发现与整理，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某些过去较少为人注意的‘地方性知识’的描述。更多的著作，实际上只是几十年来常见的《中国通史》教科书的地方性版本，有一些心怀大志、勤奋刻苦的学者，穷一二十年工夫，最后发现他所做的只不过是一场既有思考和写作框架下的文字填空游戏。传统社会区域研究中，学术创造和思想发明明显薄弱，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学术从业者追寻历史内在脉络的学术自觉的严重缺失。”<sup>①</sup>

显然，做区域社会史研究，要想不被人误解或讥讽为“碎片化”，确有必要对区域与整体及两者的相互关系有着相当的认识和把握，直至内化为研究者心中可以运用自如的一种学术自觉。区域是部分的、具体的，而社会是整体的、系统的，区域社会史是在研究具体的区域，但关注点

<sup>①</sup> 陈春声：《走向历史现场》，《读书》2006年第9期。

却应该是整体的社会。区域可大可小，是一个相对的动态性概念，而整体则是众多的区域通过一系列的内在机制所生成的但又超越了区域原有特征和属性的系统性存在，因此，区域形式上看似独立于整体，但是其存在的前提和意义正是通过和整体的紧密关联而显现的，如果脱离了整体性的存在，区域也就毫无意义可言了。真正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实际上是“形散而神不散”，即便是对原本完整的历史进行不同面相的展现，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回归到整体史层面上来。

近年来，“华南学派”的相关研究引起了社会史研究及区域社会史研究者的重视。他们三十多年的区域史研究不仅没有落入“碎片化”的窠臼中，相反，却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有助于剖析整个中国历史的实践经验与解释体系。由陈春生主编的“历史·田野”系列丛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就凸显了把区域史与整个中国史融为一体的治史理念。另外，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裴宜理的《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等海外中国研究论著，无论是在选题还是理论与方法上，都对国内历史研究产生了不容轻视的影响。它们也都是从具体的区域或事件入手，但是对区域内容的讨论则放在了整体的大历史的进程中，通过区域研究去透视具有更加普遍性、一般性的问题。例如，杜赞奇在其书中研究的是晚清至民国的华北农村社会，涉及地方政权、乡村政治、宗族、水利、祭祀、婚姻、税收摊派、市场、乡村组织和领袖等内容，但是作者通过这些看似支离破碎的农村问题，构建了清末以降华北农村社会变革背后的结构性特质，如“国家政权内卷化”“权力的文化网络”“保护型经纪与赢利型经纪”等深层问题，进而为整个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的历史演变作出了一个自己的解释。

笔者多年来倡导“走向田野与社会”，在从事明清以来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实践中，也试图通过区域研究反映整体的历史，以此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和理论。明清时期山西人口、资源、环境三要素是探讨该区域社会的重要方面，彼此间的不均衡发展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引发了众多社会问题的发生。我曾指出：“明清以来山西生态环境恶化的最突出表现是水土流失，水土流失不仅引起土地的大面积沙化，而且使汾河



流域的含沙量急剧增加。河道、渠道的变更，由森林减少而引起的气候环境的变化，又加剧了旱灾及争夺水资源的各类‘水案’的频发，这种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一直是困扰山西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sup>①</sup>基于此，我们开展了水利社会史的一系列研究，包括水资源的紧缺、争夺导致的“分水”事件，水利灌溉、祭祀与信仰，水利与造纸等手工业的运作，水环境与自然灾害的发生等，试图“以水为中心”去展现乡村民众、宗教信仰、民间组织、精英士绅、国家政权等多重力量共同作用下的山西区域社会。明清以来的山西区域社会是否“以水为中心”这样的问题仍可讨论，但我们试图通过“以水为中心”反映整体的区域社会变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保持“总体史”的眼光。区域史研究并不一定就是“碎片化”，其价值所在就体现于它与整体史的密切关系之中。

### 三 关于“进村找庙，进庙找碑”

国内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兴盛固然受到了“中国中心观”“区位市场体系”“国家与社会”等西方史学思潮比较的影响，但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理论和方法更为其提供了直接的学术资源。20世纪80年代后期，陈春声、郑振满、刘志伟等“华南学派”同行即与海外人类学机构和专家合作，开展华南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并与香港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西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多期“历史人类学研讨班”，中山大学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随即挂牌成立，历史人类学在社会史界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受到了极大关注。依笔者粗浅的理解，“华南学派”的历史人类学，其研究特色主要是在历史学为本位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吸收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从“历史与田野”的视角进行区域社会史研究。或者说，他们注重共时性结构和历时性过程的结合，在把握历史脉络的基础上，从过去如何造成现在、过去的建构如何诠释现在的问题意识为出发点，以宗族、绅士、族群认同、械斗等为切入点，研究华南地区作为特定的地域社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如何逐步纳入国家的过程及其复杂的生成关系。

正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他们的研究对象大都选择在基层与乡村，

<sup>①</sup> 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63页。